第三條戰線: 「六七暴動」中的「經濟戰」

●黃震宇

摘要:香港「六七暴動」發生五十載,學術界至今已有豐碩的研究成果。有論者基於現存數量可觀的政府檔案,探討暴動期間香港政府與左派在「文宣」和「武鬥」兩條戰線上的對壘,立體地呈現雙方的策略、抗爭及平暴的細節。本文嘗試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第三條戰線,即經濟戰線,從「經濟戰」的角度看左派與政府的鬥爭。本文首先闡述東亞冷戰格局下的香港及其經濟狀況,以呈現經濟戰背後的歷史背景。接着講述經濟戰線的形成,並從經濟戰、武鬥和文宣的角度重繪當時左派與政府在經濟領域的對壘、雙方的策略,指出三條戰線的互動。最後,本文指出經濟領域實為暴動期間左派與政府鬥爭的主要戰場,左派的挫敗乃由於雙方經濟實力懸殊,加上不敵政府在文宣和「鎮暴」雙管齊下的攻勢,以致節節敗退,實為整場抗爭的成敗關鍵。

關鍵詞:「六七暴動」 經濟戰線 聯合大罷工 文宣 武鬥

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研究成果豐碩,前人研究不乏提及暴動對香港經濟所造成的影響,卻鮮有對其中的「經濟戰」着墨①。本文提出「經濟戰線」是六七暴動中香港左派(下稱「左派」)和香港政府(下稱「政府」或「港府」)雙方鬥爭的主軸,而「文宣」和「武鬥」兩者則在表層上輔助或配合這條主軸②。當時左派的計劃是要拖垮香港經濟,而政府則要維持香港社會和經濟的穩定。下文對「經濟」所採取的定義較為寬廣:即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活動與關係的系統之總稱,故不單指一般的商品買賣,同時亦涉及資源分配和供應。

* 承蒙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何佩然教授予以參與研究的機會,啟迪筆者對香港史的研究 興趣,並開拓筆者的研究視野。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保存大量珍貴的檔案, 對撰寫本文幫助甚大,特此致謝。另蒙兩位評審提示修改建議,復蒙《二十一世紀》 張志偉先生及編輯部提示和建議,統此敬致謝忱。 因此,六七暴動期間左派發起的罷工和罷市,無疑是左派與政府之間經濟戰的序章,緊隨其後的則是糧食、供水、貨幣等局部戰場的爭鬥,而在文宣、武鬥兩條戰線的配合下,雙方在三條戰線上鬥智鬥力。本文旨在重構暴動期間經濟戰的動態發展,描繪雙方在各個局部戰場的鬥爭情況和策略,指出經濟領域實為左派與政府爭鬥的主要戰場,以及點出左派最終失敗的原因。

一 東亞冷戰格局下的香港

若要重新評估六七暴動及其經濟戰線之種種,既不應只停留於本地勞資 糾紛或左派鬥爭,亦不僅限於香港、英國及中國三方的互動關係,而必須把事件放置在東亞冷戰格局之中加以考察。冷戰時期全球政治為美國、蘇聯兩個大國主導,構成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兩個陣營及權力板塊,而中國則在美、蘇兩個大國間作外交博弈,互相牽扯和制約。若我們把中、英、香港三方置於東亞冷戰格局的歷史脈絡,將有助於更深入理解三方對暴動的判斷及取態,例如戰後香港對中、英雙方皆有可觀的戰略和經濟價值,故兩國均不願看到任何影響現狀的風波發生③。

戰後,英國政府十分關注香港在政治、經濟、軍事三方面所呈現的「脆弱性」④。香港往後的發展,無不在中國的陰影下,同時又受到冷戰政治的影響。尤其在經濟方面,1950年代初,美國為了向中國實施封鎖與禁運,遂對香港實行貿易管制,幾乎拖垮香港長期以來的轉口港經濟,卻意外地造就香港轉型為工業城市,鋪墊1960年代經濟騰飛的道路。在1960年代,香港經濟以「製造業中心」及「轉口港」為定位,並以製造業、進出口貿易、商業、旅遊業為經濟上的「四大支柱」。根據1966年中期人口普查的數據,當時全港勞動人口約有140萬,其中製造業的就業人數有55萬,約佔全港勞動人口的四成(39.4%),其次是服務業(24.1%),以及商業(16.7%)、通訊業(6.8%)、建築業(6.2%)等⑤。上述主要行業的勞動力分布,恰好顯示六七暴動前夕香港以製造業為核心的經濟狀況。在生產、供應與消費的經濟鏈上,製造業佔據上游位置,倘若有半點差池,便會影響下游產業(如進出口貿易、商業、服務業等)的發展。

香港在冷戰下的東亞及全球經濟中的角色可從其商品出口狀況一見端倪。在1960年代,香港商品出口的地方都是資本主義陣營的先進國家,其中每年對英、美的總出口額在香港整體貨物出口額中佔很大的比重。1966及1967年,香港對美國的總出口額佔總額的36%及37%,對英國的總出口額均佔17%,而其他國家所佔百分比僅為單位數字⑥。由此可見,香港成為東亞地區的「世界工廠」,而英、美兩國更是香港的主要出口市場。

另一方面,冷戰初期的中國與大部分資本主義陣營國家並未建交,一般 僅限於貿易及民間聯繫,加上美國的牽制及意識形態的對立,雙方關係發展 緩慢和有限⑦。在這個形勢下,香港遂成為中國對外出口貿易的主要夥伴。 在這時期,香港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可謂互惠互利,各取所需,香港從中國進

「六七暴動」中 55 的「經濟戰」

口原材料及食品,而中國則從貿易中賺取可觀的外匯®。這樣,香港不但是 資本主義陣營在東亞的前哨,而且成為中國與英、美在經貿聯繫上的縫合 點,逐步成為東亞地區的製造業中心及重要轉口港。

中國雖然面對資本主義陣營的圍堵,但並無改變對港政策,繼續維持經濟聯繫及民間往來。張少強曾以「錮身鎖命」來形容中國的對港政策,意謂北京透過內地對香港的食水及食物供應,加強香港對內地的依靠,從而增加中方在香港問題上與英國談判的政治籌碼⑨。戰後香港急劇增長的人口令這個彈丸之地面對住屋、糧食及食水等方面的壓力,糧食進口成為穩定香港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華人的主要食糧大米就是一例⑩。至於副食品,如魚肉及蔬菜,除本地供應外,中國進口也是其中一個主要來源。此外,1960年代東江供水與其他水務工程,也顯示港府相當重視淡水資源,而中國亦深知香港水源短缺的問題。淡水是食水、工業用水及其他行業用水的主要來源,所以供水問題既關乎當時香港370萬市民的存活和生計,也會影響不同的經濟活動,尤其是製造業和飲食業。紡織業是當時香港工業的大宗,故淡水資源對本地工業發展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⑪。由此可見,無論是日常生活還是工業發展,香港的一些經濟條件(如食品及淡水供應)都需要中國的支持。

在東亞冷戰格局下,香港既是資本主義陣營在東亞的前哨,又是中國唯一的對外窗口,在兩大陣營間有着十分特殊的位置。這個位置亦是1967年 六七暴動的背景舞台。

二 「五月風暴」:經濟戰線的形成

六七暴動的起因源於1967年5月6日九龍新蒲崗人造膠花廠的勞資糾紛, 後來卻發酵成一場被左派稱為「五月風暴」(或「反英抗暴」)的騷動⑩。1960年 代,塑膠業是香港重要的新興輕工業之一。據官方統計,1967年全港一共有 1,567間塑膠製品廠,其中328間為塑膠花廠,合共聘請了55,822名工人,佔 同期製造業勞動人口的12.6%,僅次於紡織業及成衣業⑬。從客觀環境來看, 塑膠業的勞工問題蘊藏着轉化成工人運動的能量,只欠一個喚起工人反抗的 領導者;而當時介入勞資糾紛的左派正扮演領導者的角色。

受到1966年澳門「一二·三事件」的鼓舞,加上中國文化大革命浪潮的影響,香港左派策動對抗政府的行動,從1967年5月展開連串抗議行動和零星停工,到6月改為發起大型罷工和罷市,再到7月增添「暴力」手段,社會「騷動」逐漸演變成「暴動」⑩。不同的抗爭手法有着一個共同目標,乃要迫使政府屈服,而達致這個目標的最直接方法則是動搖政權的管治基礎,即香港的經濟。左派有見5月的抗議行動未能迫使政府屈服,遂於6月發起「聯合大罷工」,務求在經濟上動搖政府的管治基礎。若說5月期間的示威、聲援、遊行屬政治層面的反抗和異議,那麼6月展開的罷工、罷市無疑是經濟層面的抗爭運動,正式拉開經濟戰的序幕。後來左派重申要「從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反擊敵人」,其中對經濟戰的形勢有以下評估,反映左派對這個戰略的肯定⑩:

在經濟上,萬人聯合大罷工打響了反擊港英的第一炮。五萬各業工人聯合大罷工,再加上八萬五行小販罷市和各業愛國商人聯合罷市的配合,聲勢更大,這些都促使香港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這兩個月來,外資銀行已被提存十多億元,股票市場一再停市,十億資金外流,港英財政計劃被打亂。作為港英[三大經濟支柱]的出口貿易、建築業和旅遊事業,已成陰虛內傷,港英機構和英資企業損失尤其嚴重。工人的鐵拳一擊,港英已呱呱大叫了……

在整場經濟戰中,港府和左派博弈對壘各有目的。港府為了恢復社會秩序,保衞香港經濟和財產,故採取「鎮暴」的行動,港府與倫敦在立場上是一致的。至於左派則透過文宣和武鬥的配合,打擊政府的管治威權,其中一個目標是拖垮香港經濟,部分人更相信他們的行動最終會配合中國提早「解放」香港。不過,北京雖然在對外的言論上支持香港左派的行動,但始終勒住左派的激進行動,不希望香港現狀有任何變動⑩。若然香港社會出現動盪,影響經濟發展,中國的外貿利益同樣會受到創傷,造成香港和中國雙輸的局面,故北京時刻抑制文革風潮波及香港。

人們對六七暴動的歷史印象,最深刻者莫過於「炸彈陣」。然而,這種武鬥方式只是整場騷動的表層,騷動的深層或核心卻是經濟戰。左派後來轉用武鬥的最主要原因是大罷工達不到預期效果,無法在短期內脅迫政府讓步。在左派開闢經濟戰線、有計劃地以罷工和罷市達到目的期間,曾出版不少宣傳小冊子講述5、6月以來的事態發展,如《組成浩浩蕩蕩的反英抗暴大軍》、《血債血償》、《以牙還牙》等⑪,當中包括罷工、罷市的情況,意在為經濟戰 造勢。可見在這個情況下,文宣是輔助經濟戰線的重要一環。

三 左派與港府在經濟戰線上的交鋒

經濟戰的成敗關鍵在於正常的經濟活動能否得到維持。時任《星島日報》總編輯鄭郁郎曾點出暴動期間「香港的生命線就是貿易,沒有貿易香港便無法生存」®。從1960年代香港經濟狀況來看,工業、商業、貿易三者相繫於同一條經濟鏈,環環相扣。當時香港的商品產量大大超過本地需求,如果沒有轉口貿易,只會造成商品的囤積。所以,左派自1967年6月起逐步把抗議行動升級,如策動工人及海員罷工,並鼓動左派商人罷市,乃切實考慮到香港的經濟情況,在經濟領域中向港府宣戰。

(一)聯合罷工

由於5月下旬零星的停工抗議無效,左派為了扭轉形勢而計劃罷工,並逐 步將行動升級,對港府的鎮壓作出反擊。6月10日,左派組織政府部門職工和 英資企業工人率先發動大罷工,涉及的公共部門及私營機構包括海事處、郵政局、水務局、煤氣公司、天星小輪、牛奶公司等,矛頭直指政府及英資財團®。當時,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聲稱抗爭「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另一方面,政府並無因左派發動首輪大罷工而鬆懈,繼續打擊左派,刺激左派把罷工行動升級。

左派為了組織規模更大的「聯合大罷工」,從6月11日起調動人力、物力,在一個月內收到各界捐款約2,328萬元,支持工人的「抗暴鬥爭」。部分款項用作補貼罷工工人的生活開支,這些經濟資源為「聯合大罷工」打了一支強心針,並意味左派的抗爭不會在短時間內中止愈。6月23日,港九海運、水陸交通、公共事業、船塢和主要紗布廠等二十個工會鬥委會發表「聯合大罷工告各業工友書」,宣布翌日起進行罷工。其後,各界鬥委會、各業工人鬥委會亦為此發表聲明表示支持。同時,天星小輪工人鬥委會亦號召當時「復工」的工人再度罷工。於是,6月24日出現規模更大的「聯合大罷工」,號稱有六萬工人參與②。

從6月10日首輪大罷工到24日「聯合大罷工」來看,左派逐步把罷工升級,首先針對的是政府部門和英資財團,後來波及港資企業。表1列出6月以來受罷工影響的企業及相關資料:

企業名稱	主要資本來源	其註冊公司名稱		
牛奶冰廠有限公司	英資	牛奶冰廠有限公司		
香港油蔴地小輪有限公司	港資	_		
天星輪船有限公司	英資	怡和有限公司		
		(Jardine Matheson & Co.)		
香港電車有限公司	英資	怡和有限公司		
中華巴士有限公司(中巴)	港資	畢馬域蔑曹會計師行		
		(Peat, Marwick, Mitchell & Co.)		
九龍汽車(一九三三)有限	港資	畢馬域蔑曹會計師行		
公司(九巴)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英資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英資	畢馬域蔑曹會計師行		
香港電話有限公司	英資	匯通有限公司(香港)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英資	會德豐有限公司		
太古船塢有限公司	英資	羅兵咸會計師行		
		(Lowe, Bingham & Matthews)		
香港黄埔船塢有限公司	英資	畢馬域蔑曹會計師行		
九龍倉有限公司	英資	怡和有限公司		

表 1 1967年受罷工影響的主要企業及其資本背景

資料來源: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Ltd., *Year Book: Comparative Figures 1966-1968* (Hong Kong: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Ltd., 1968); *Year Book: Comparative Figures 1965-1969* (Hong Kong: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Ltd., 1969).

當時受到罷工影響的主要是英資和港資企業,它們掌握香港主要交通及公用事業的業務,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及社會日常運作有很大影響力。汲取1966年九龍騷動的教訓後,政府擔心任何的社會衝突均有可能演化成大型騷動,於是對左派的對抗性行動不敢怠慢。交通事業是當時罷工打擊的重點行業,中巴、九巴分別負責港島和九龍的陸路交通,而天星小輪及油蔴地小輪則負責來往港九兩地的水路交通,乃維港兩岸的交通命脈。若左派罷工持續下去,切斷市區的交通,定會影響日常通勤,窒礙人流、物流,破壞生產鏈、供應鏈與消費鏈的正常運作,干擾本港經濟的發展。這就是九龍騷動後政府擔心任何騷動均有可能「使本港的大部分地區陷於癱瘓」②的原因。因此,政府必須採取措施反制左派發起的罷工。

早在6月的大罷工前,港府已關注左派的策略部署及動態。據一份官方內部文件《1967年騷動》(Hong Kong Disturbances 1967)所説,左派在5月下旬所發起的停工涉及運輸業及公共服務,乃是一種戰略調整,目的是抗議政府不接受左派的要求②。政府既能指出5月的停工純屬政治姿態,就有能力判斷後來左派組織的大罷工是一場經濟戰線上的真正較勁,並作出適當的應對策略。

表2 政府部門及公用事業機構的職工情況(截至1967年10月4日)

	騷動前	罷工後	解僱人	復職人	新聘員	目前職	目前職	
	職工總	解僱人	數佔工	數	工人數	工人數	工人數	
	數	數	人總數				佔騷動	
							前人數	
政府部門								
海事處	1,187	318	12%	81	36	986	83%	
水務局	2,325	283	11%	132	289	2,463	106%	
機電處	2,421	264	5%	2	112	2,271	94%	
土木工程處	2,510	119	1%	1		2,392	95%	
徙置事務處	4,537	39	4%	3	63	4,564	101%	
市政事務署	12,470	485	9%	4	465	12,454	100%	
郵政局	1,688	151	12%	1	151	1,689	100%	
公用事業機構								
天星小輪	590	590	100%	389	69	456	77%	
油蔴地小輪	1,885	115	6%	10	77	1,829	97%	
香港電車	1,713	679	40%	2	478	1,220	71%	
中華巴士	2,360	1,273	54%	80	326	1,428	61%	
九龍巴士	7,194	4,907	68%	720	760	3,687	51%	
香港電燈	978	148	15%	12	54	858	88%	
中華電力	2,745	709	26%	52	319	2,407	88%	
中華煤氣	548	334	61%	170	41	390	71%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 "Emergency Statistical Report", 4 October 1967, HKRS890-1-7, Local Disturbances, enclosure 5。

政府應對左派挑戰的方法是與本港主要公用事業機構互相配合 (26),解僱無故曠工的工人,另聘新員工。據一份政府檔案披露,在1967年9月至10月期間,政府曾調查政府部門及公用事業機構的職工情況,從表2所見,左派發起大罷工對政府部門的衝擊不算很大,解僱人數最多亦只佔該受影響部門總職工人數的十分之一。最受影響的署級部門無疑是工務司署,當時水務局、機電處、土木工程處均隸屬該署。左派大罷工固然能在短時間內干擾日常交通及公共服務的運作,但成敗的關鍵始終在於罷工的持久性及影響的廣泛度。港府正看穿這一點,用「替補」的方式,以新聘員工填補罷工者的空缺。

公用事業機構所受的衝擊明顯比政府部門為大,例如,天星小輪在騷動發生前有590名員工,罷工後解僱全數人員,但後來又有389名員工復工。該公司採用全數解僱員工的激烈手法,然後藉「復工」來考驗員工對公司的忠誠。另外,中巴、九巴、中華煤氣三間公司在罷工期間解僱的人數亦頗多,均超過全體員工的一半。從復工人數看來,願意復工的員工不多,顯示罷工工人堅決參與罷工。就10月初職工人數所見,大部分公用事業機構未能恢復至騷動前的水平,估計當時部分公共服務未能完全恢復正常,九巴及中巴就是明顯的例子,兩者當時的職工人數佔騷動前人數的百分比分別是51%及61%。整體而言,公用事業機構聘用新人替補空缺的能力不及政府部門,故「復工」的那扇門依然向員工打開。與此同時,部分罷工工人拒絕復工,反映他們對罷工的堅決態度。

(二)海員罷工

如上所述,由於香港日常糧食主要依靠進口,加上作為貿易轉口港,因 此港口對當時香港經濟舉足輕重,亦是這場經濟戰中的一個必爭之地。香港 海員工會在7月17日號召全港海員罷工,拒運貨物進出香港,擴大罷工對貨 運所造成的壓力。據《1967年騷動》分析,當時左派曾在港口及海上使用恐嚇 手段,意圖迫使海員參與罷工。例如,左派份子會混入海輪船員中,隨身帶 備報紙及文宣作品,善用任何一個機會向海員灌輸和傳播顛覆思想 ②。由此 可見,經濟戰與文宣攻勢互相配合,左派藉文宣以擴大動員能力。

政府承認左派針對港口的攻勢對離鄉背井的海員有相當大的影響。海員罷工前,海事處已作出相應措施,一方面向海員發出措辭強硬的通知,告知無故曠工的後果;另一方面成立一支團隊,成員都是具備資歷的職員,他們的任務包括:與海員溝通、討論他們所面對的問題、傳播正確信息、調查和消除謠言。上述措施正好與左派的文宣手段針鋒相對,有助釋除海員的疑慮。這段時間,海事處甚至作出特別安排,時刻向海員提供香港最新局勢的資訊②。海事處轄下的海員招募處(Seamen's Recruiting Office)在罷工首十天錄得1,222名海員報到,並只有兩艘輪船因缺乏船員而延誤船期。另外,船隻抵港後,有部分船員無故離開,約有十多艘輪船人手不足,但當時仍有足夠的替補者補充這些泊位工作的空缺②。

雖然政府積極應對左派的攻勢,但針對港口的干擾並未完結。到7月底,中國外輪代理公司向香港代理人傳話,指中國內地港口的工人會支持香港海員工會的行動。內地的發貨者拘留了原本經香港轉運的貨物,以致沒有貨物從中國運來香港。同時,左派代理人通知不同國家的收貨者,指受到香港港口罷工的影響,貨物無法如期運送 ②。這樣不但妨礙香港日常的轉口貨運,亦破壞香港的轉口港形象和信譽。無論港府如何減低罷工行動所造成的損失,由內地運來香港的貨物數量一直處於波動的狀態,政府把這個問題歸咎於中國大陸局勢不穩、缺乏人手及資源等因素。從內地運來香港的貨物數量從8月的5,000噸,增至10月的49,000噸,再回落至12月的26,000噸。另外,1967年5月至12月期間,本港錄得總卸貨量為4,610,273噸,相對於去年同期的4,868,475噸,跌幅約為5%。至於1967年同期八個月的總裝貨量,錄得1,504,646噸,相較去年同期的2,034,410噸,跌幅約為26% ②。因此,左派文宣聲稱出入口貨量受到影響,並非不合理。

1969年3月,海事處完成一份調查報告,當中提到本港一些碼頭及貨倉公司在騷動期間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調查報告不但反映當時左派對碼頭、貨倉、船塢這些據點進行打擊,同時顯示港口貨運(尤其是英資財團沾手的業務)對香港經濟的重要性,使政府日後加強港口的防範⑤。

(三)商人罷市

左派在6月下旬發起罷市。6月28日,港九工商界、小販、百貨、糧油、食品、土產山貨、南北藥材、建築材料、出版印刷等五十九個單位鬥委會,發表「聯合罷市宣言」,宣布從6月29日到7月2日聯合罷市四天,這次聯合罷市「使市面呈現一片蕭條景象,給予港英經濟以沉重打擊」②。左派誓言中斷從中國內地輸入食品,糧食供應遂成為另一個戰場。

此前,政府已洞悉左派將會干擾本港的糧食供應,故成立一個跨部門工作小組應對。政府認為左派擁有大型進口及批發公司,掌握內地輸港食品的流量,不難中斷供應。當時有些零售商更受到威嚇,若不參加罷市,便不獲供應內地貨品。大罷市的四天,內地貨品沒有從水路、陸路、鐵路運來香港,但大部分的本地商店仍然營業。罷市期間,新界的農產品有助紓緩糧食不足所帶來的壓力,不過物價始終難免上升。到7月2日,罷市結束,內地恢復供應食品③。

罷市雖然有驚無險地結束,可是內地供港食品的數量在7月間再度減少,這次起因是文革所造成的社會局勢不穩定,影響內地輸港的食品供應。港府指內地供港食品從7月到9月大幅減少,直到年底,情況亦未回復到1966年的水平。當時最受影響的食品有豬肉、牛肉、蔬菜及雞蛋,供應量減少引致物價大幅上升②。縱使短時間內本港糧食不會出現短缺,但物價高漲卻會影響市民生活,動搖人心。政府為了平抑物價,考慮從外國進口食品,並派遣代表團外訪,探求從日本、南韓及沖繩增加食品進口的可能性。此外,進口商自9月起從台灣、泰國、印尼及柬埔寨進口豬隻及牛隻,而本港農場亦增加豬隻、牛隻、蔬菜的供應,這些都有助抑制食品價格上升圖。

事後看來,左派號召的罷工和罷市雖達不到預期效果,卻不代表這是策略上的錯誤,因為左派洞察到當時香港的經濟特性,先後發動罷工和罷市,目的是效法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務求拖垮和癱瘓香港經濟,使香港成為「死港」、「臭港」⑩。可是左派忽視了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環境在四十年間已有很大的轉變,如人口增長和城市擴張均會影響罷工的成效。左派宣稱前後共有6萬人參加「聯合大罷工」,而當時全港勞動人口有140萬,故罷工人數只佔全港勞動人口的4.3%。若加上罷市的8萬人,合計14萬人,亦只佔全港勞動人口的10%。由此可見罷工及罷市的影響有限,無法與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相比⑩。雖然在短時間內,罷工及罷市確能對香港經濟活動產生相當的干擾,但隨着時間推移,左派逐漸失利。

四 武鬥、文宣與經濟戰的關係

(一) 武鬥與經濟戰

如上所述,在經濟戰中,武鬥和文宣兩條戰線是經濟戰線之側翼,三者交互纏繞。武鬥的最大作用不僅是直接行動及其破壞力,更是在心理上震懾對手,脅迫對方讓步。從1967年5月到8月,市區有多架車輛遭到破壞,反映部分左派人士放棄遊行、示威等和平方法,轉而使用暴力手段,可見街頭抗爭的激進化圖。這不但增加政府的管治成本,亦加重其政治壓力。若說罷工和罷市是一種造成經濟壓力的行動,那麼武鬥在經濟戰中就有「加壓」的作用。

初期的遊行、示威以及後來的暴力襲擊,不但擾亂市民的日常生活及商販的零售活動,也影響到香港的商業活動。以股市為例,《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提到5月12日九龍區的騷動使當日股市暴跌,其後的兩個星期股市暫停交易,到6月再度暫停⑩。事實上,這兩次停市不但受5月的騷動影響,也與同期的中東危機有關,內外因素一同影響本地股市。同時,《遠東經濟評論》股價指數(FEER Share Index)由5月初的高位約98點,到8月下旬徘徊在73至74點之間,可見騷動影響本地投資者的信心⑩。騷動所帶來的不明朗因素,以及內外交侵下的股市波動,無疑會動搖投資者對香港市場的信心。

當港口出現罷工的時候,市區騷動的情況也愈來愈激烈。7月12日,大 埔鄉事會會所首次出現土製炸彈,掀起炸彈陣的序幕,成為整個情勢的轉捩 點,使社會進入惶恐不安的另一階段。到8月,社會上更流傳一張暗殺名單, 威脅社會賢達⑪。左派陣營中,對新的武鬥方式各有看法,反映當中既有激 進派,亦有溫和派。從7月到12月,除了激進派的炸彈陣外,較溫和的左派 群眾仍一直參與示威、集會,從未間斷,雖然換來警察一次又一次的鎮壓⑫。

激進人士在市區各處擺設炸彈陣,引發市內恐慌,影響市民日常生活, 而首當其衝的是零售業和旅遊業。當時炸彈在鬧市(包括啟德機場及希爾頓酒 店等處)出現,緊急狀態嚇怕訪港旅客,使他們不敢上岸,或只作短暫停留。 庫珀(John Cooper)指出1967年1月至5月間的訪港旅客人數較去年同期為多,但6月至12月間的訪港人數卻較去年同期為少,可見暴動減低旅客訪港的意欲,旅遊業深受暴動的影響 ❸。

據《1967年騷動》指出,從7月中到12月,發現可疑炸彈的報告有8,352宗,其中1,420宗證實是真炸彈④。炸彈攻擊的數字到10月明顯上升,官方認為這一方面是針對聯邦事務國務大臣石寶德 (Malcolm Shepherd) 訪港,另一方面是為了干擾「香港週」展銷會的進行。香港週展期從10月30日到11月5日,是向海外買家推廣香港產品的展銷會,目的為加強海外商家對香港工業產品的信心。不過,左派認為政府舉辦香港週的真正動機是與廣州秋季廣交會唱對台戲,拉攏廣交會的客源圖。左派在11月2日於九龍土瓜灣舉辦「骯髒週」街頭展覽大會,展示漫畫及「平暴」所遺下的物品,批評政府的做法,實乃針對舉行中的香港週圖。左派甚至計劃舉辦國內產品的展銷會,轉移人們對香港週的注意力圖。

自左派發起大罷工以來,持續開拓不同的戰線,「聯合大罷工」和「海員罷工」更號稱為「反英抗暴鬥爭的主要戰場」⑩。可是,另闢戰線亦反映左派的戰略達不到預期效果,無法一下子撼動香港經濟,猶如左派所致力效法的省港大罷工一般,動搖政府的管治基礎。經濟戰是一場持久戰,更是一場消耗戰,後來出現的炸彈陣正好表明部分左派人士對經濟戰並不樂觀,故改為採取更激烈的武鬥方式。

政府並無對左派的升級行動示弱,加強對左派人士的搜捕。據左派的統計,在5月至10月期間,受襲的左派單位共有168個,其中工會佔93個,學校15間,文化單位15個,國貨公司17間,銀行宿舍3間,其他單位則有25個,受襲次數合計237次;被捕人數方面,合共4,424人,其中7月份便有1,448人,佔了這期間總被捕人數的三分之一,足見政府自7月起確是加緊力度打擊左派活動。在被捕人士中,工人佔了很大的比重,共有2,180人,為總數的49%⑩。這裏顯示工會及工人成為政府打擊的重點目標。

(二) 文宣與經濟戰

當左派的武鬥無法迫使政府屈服並開始節節失利的時候,文宣在經濟戰中的作用變得尤其重要。文宣的最大作用並非呈現一個客觀事實,而是「再現」(represent)一個敍述者期望讀者所接收到的信息。這些信息必然對敍述者一方有利,如塑造我方正面形象、建構敵方負面形象、煽動有利我方形勢的大眾情緒等。前文提到在港口出現的文宣攻勢,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1967年下半年,香港先後出現食水短缺及英鎊貶值危機,足以影響經濟發展及動搖民心,成為左派藉文宣打擊政府的戰場。

1967年是香港發生嚴重旱災的一年,年初全港水塘的存水量有168億加 侖,但到6月初卻只有30億加侖,政府勒令制水,每日供水八小時,其後改 為每日供水四小時,甚至每四日供水四小時⑩。暴動期間正值香港出現旱 災,左派沒有錯過機會,在供水問題上打宣傳戰。7月24日,左派報章批評工務司鄔勵德 (Michael Wright)「嫁禍中國」,把「制水升級」歸咎於中國「不供水」,並指「今年供水已超額,夏季不供水是英方提出的」⑤。另外,左派指制水是港府的「陰謀」,當局根本沒有必要限制供水,暗示制水是政府壓迫市民的手段。同時更指山頂區並無制水,而該區的居民主要是富裕的歐洲人,暗示這是民族與階級的雙重壓迫 ②。

事後看來,制水是當時客觀環境使然下政府唯一可用的方法。由於中國內地文革造成地方行政混亂,以及天旱是跨地域的自然現象,沒有證據顯示中方為加強向港府施壓而刻意「斷水」⑤。反之,左派不斷就供水問題大做文章。雖然中方自10月起恢復輸水,但礙於內地的政治形勢,港府對內地輸水仍有隱憂。為保證本港二十四小時供水,港府曾抽調船灣淡水湖的食水,但船灣淡水湖當時仍未正式運作,故水中帶有鹹味 ⑩。當時市民飲用食水感覺到鹹味,左派即指這些食水對健康有害,批評政府的做法。事實上,這些食水的鹽度並無超出世界衞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的標準,政府一直謹慎確保食水可安全飲用 ⑥。

無論在制水措施還是食水鹽度問題上,左派都借題發揮,動員宣傳機器向政府展開攻擊,務求化「虛」為「實」,把不存在的「陰謀」變成真實發生的事,足見文宣在經濟戰中的作用。如果說,罷工這類抗爭方式是直接的「實擊」,那麼製造輿論就是「虛擊」。雖然是「虛擊」,但可以造成一定的社會震盪,動搖市民對政府管治的信心。

11月,左派鬥爭呈膠着狀態。左派的經濟戰雖然對香港經濟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擾,但對本港經濟帶來最大影響的並非左派的行動,而是英鎊貶值 题。事緣英國政府在11月18日宣布英鎊貶值14.3%,牽動全球經濟,首當其衝的是英鎊區的成員,包括香港。港府在19日宣布港幣跟隨英鎊貶值14.3%。23日早上,政府宣布港幣增值10% 题。這四日間,港幣實質貶值5.73%,物價亦受到影響。除了這四日間出現的物價波動外,從11月到12月,食品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在一個月內上升兩點,物價短時間內上漲無疑會加重市民的生活負擔,誘發社會不滿情緒 题。香港是當時全球英鎊的最大持有者之一,估計總值3.5至4億元,香港因英鎊貶值而損失約6,000萬英鎊 题。正當港府為此苦惱時,左派把握製造輿論的機會,改變策略,從採用暴力手段轉為重新爭取民眾的支持。例如當時《大公報》以頭版報導港幣貶值一事,批評此舉是政府「轉嫁經濟危機」,實乃「強搶」市民荷包,不但造成物價上漲,增加市民的生活開支,亦對工商業帶來影響,加劇工人失業問題,對社會上「廣大同胞」的生活帶來嚴重的影響 题。於是左派藉着港幣貶值所帶來的經濟危機,掀動民眾的不滿情緒,以此淡化民眾對政府的支持,從而拉近左派與市民的距離 题。

此外,當時美國保證美元不會跟隨英鎊貶值,黃金價格亦維持不變,對穩定英鎊有一定的幫助愈。左派曾作出相當措施應付港幣貶值,在11月19日深夜,左派小銀行集團「向中國銀行及本身銀行提取一億港元,參與搶購黃金與美鈔」。但

由於港府在23日早上「忽然宣布港幣增值百分之十」,左派機構最終「平空損失了二千萬元」®。這裏可見左派在這場「貨幣戰爭」中不但無法保值資金,甚至招致損失,同時也顯示政府穩住局勢的能力。英鎊貶值成為當時左派最有力的政治宣傳武器,但在政府眼中,這也是他們當時唯一可用的武器。

五 經濟戰的尾聲及雙方的勝負

左派在經濟戰中失利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乃是其經濟實力遠比不上政府,在消耗戰中必先受挫。左派只有有限的經濟資源,要在特定時間內以罷工手段來脅迫政府,實屬不易。反之,政府憑着其豐厚的經濟實力,步步為營,扭轉形勢。例如,政府能用銀彈政策拉攏傳媒,安撫公務人員。政府在檢討1966年九龍騷動時早已明白一點:傳媒不是政府的自然盟友,卻是成敗的關鍵⑩。因此,政府在1967年5月的騷動發生後,即採取銀彈政策令香港傳媒歸邊。據說,政府在5月下旬曾向本港所有報社送去一份題為「維持安定繁榮」的廣告,左派報社亦同樣收到。假如報社刊登該廣告,不但可收取廣告費,亦表示其支持政府的立場⑩。政府透過這個方法,一方面可以拉攏親政府的傳媒,另一方面使得親左派或同情左派的報章現形。

當左派把「階級問題」升級成「民族、反帝的鬥爭」時,不斷透過文宣攻勢 拉攏華人公務員,政府由此對華人公務員的忠誠感到擔憂,故需要安撫人 心,特別是前線警員。據說,政府在騷亂期間向警察發放津貼,待遇也比平 時更為優厚。政府把警員薪酬提高百分之三,又補償他們的額外工作。自5月 起,每人更可獲取每天23元的特別津貼,當局甚至為隨時候命的警員提供 免費伙食⑥。此外,不少公務人員在暴動期間加班,如勞工處、警隊和民安 隊等曾合力充公煙花製品,政府事後亦向值勤人員提供津貼⑥。由此可見, 政府透過提供津貼向公務人員表示關懷和鼓勵,這不但有助鞏固公務人員 的忠誠度,亦能提高士氣,讓他們在極大的工作壓力下繼續執法和處理日常 公務。

左派在罷工期間亦曾採用銀彈政策,向罷工者發放慰勞金(即生活費)。 時人曾估算左派為支援罷工工人所用的資金:以當時罷工者一萬人計算,每 人分發約300元,經費共需約300萬元。當時鬥委會有資金2,000萬元,故能 維持約六個月的支出。知名學者陳君葆認為「經濟鬥爭,曠日持久,是否會生 厭倦,又是一問題。倘需速決,搞人民戰爭……自是一辦法」⑩。這番話顯示 陳君葆對左派形勢及經濟戰的洞見。經濟戰本身是一場持久戰,左派只有半 年的時間來迫使政府屈服。這個嚴峻的局面解釋了為何當左派的戰略達不到 預期的目標,當「大好形勢」以月復月走向政府一方之時,左派陣營中的激進 派寧可採用暴力手段試圖扭轉劣勢。

左派在10月曾發起名為「一元運動」的募款運動,救濟失業工人®。據左派報章指出,不少工廠在騷動期間倒閉,造成大批工人失業,左派把責任歸咎於「港英的迫害」⑩。但從右派的角度來看,一元運動反映「罷工鬥爭已全盤

失敗,也再無力以金錢接濟那些失業工人」①。雖然左派指出這些批評是把「罷工工人同失業工人混為一談」,又強調「反英抗暴鬥爭」並不是「造成工人失業的原因」②,但若根據上文陳君葆的判斷,一元運動表面上聲稱支持失業工人,實際上卻反映左派將近彈盡糧絕,支援罷工工人的資金已經所餘無幾。

1968年4月下旬,左派報章評價十個月以來的罷工行動,認為罷工「加上其他鬥爭方式的配合,狠狠地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給予港英反動統治以有力的打擊」③。這時,左派動員工人復工,但指責政府多番阻撓(如向資方施壓),故重申工人「罷工有理,復工有權」,「警告港英不容侵犯復工的正當權利」。4月29日,「海員、海陸理貨員、碼頭、天星、油蔴地、九龍倉、躉船及小輪等單位」約二千名工人舉行誓師大會,批評政府做法,並重申復工的權利②。工人失業或復工問題本屬左派面對的棘手問題,但在左派的文宣策略下,卻被包裝為一個社會問題,亦即是政府需負的責任。

誓師大會這類場面或許讓人聯想起「五月風暴」時左派的動員能力,但如今不同的是,「復工」顯示左派不能再打這場經濟上的持久戰。翻查1968年4月至6月的左派報章,時有提及工人復工的報導,可見「復工」已經成為一個重要議題。當初的罷工者轉眼間成為失業者,既不能重操故業,只有轉工,又或改行,故出現後來「復轉改」(復工、轉工、改行)的政策。從「罷工」到「復轉改」,這一年間恰恰反映左派在經濟戰線上的抗爭軌迹——開始、發展和消亡。

如前所述,左派和政府均在經濟戰中採取銀彈攻勢,雖然左派首先離場,卻不代表政府的經濟能力絲毫無損®。對政府而言,騷動期間的額外津貼是非經常性開支,也是一種額外的管治成本。在1967年9月6日的立法局會議上,財政司郭伯偉 (John Cowperthwaite) 回答議員所提出的質詢時,特別提到截至當年7月底的「特別緊急開支」估計為1,350萬元。他指去年度錄得1,200萬元盈餘,估計本年度會有3,700萬元赤字,故兩者差值為4,900萬元,間接指出1967年政府所承受的經濟損失®。這裏可見1967年的騷動增加了政府的財政負擔和管治成本。當時左派預測政府會虧蝕6億港元®,而議員的質詢正好反映社會對政府財政狀況的疑慮,郭伯偉此時交代政府的公共財政狀況,既可減低公眾的疑慮,又能制止左派的謠言。據官方年報,1967至1968年度政府錄得財政盈餘1.3億元®,比去年度還要多。

左派在經濟實力上與政府的差距,使前者不得不為抗爭條件及時間設限。左派在半年內未能透過文宣和武鬥收窄與政府的差距,遑論迫使對方屈服。反之,政府加大力度打擊左派的活動,在暴動期間多次修訂《緊急措施規例》(Emergency Regulations),為警方鎮暴提供權力來源及合法性依據;並輔以駐港英軍協助,加強鎮暴的武裝力量。隨着政府在文宣和鎮暴雙管齊下的攻勢,使左派原本有限的資源更為緊絀,呈現節節敗退之勢。對於政府而言,暴動的風波、管治成本的增加以及面對的管治困難,讓其深深體會到未雨綢繆的道理。與其在經濟戰中面對各方面的打擊和無休止的消耗,倒不如致力於預防性的治理工作。這樣就促使政府有意識地制訂長遠政策,改善社會環境,避免社會矛盾成為日後騷動的種子®。

六 結語

本文展現六七暴動期間左派與政府在經濟戰線上的較勁,描繪各個局部 戰場的情況和雙方的策略,帶出文宣、武鬥在經濟戰中的作用,並點出左派 最終失敗的原因。在六七暴動中,經濟領域是左派與政府對抗的根本戰場, 可謂是雙方的命脈。因此,重構當時的經濟戰線可讓我們更立體地檢視雙方 對壘的過程。

本文爬梳歷史細節,避免任何化約的論調。通過檔案資料的梳理,對1967年六七暴動所造成的經濟影響,不再止於評論損失的多少,而是重構經濟戰的動態發展以及左派與政府之間球來球往的鬥爭。當左派發動經濟戰,展開一波又一波的攻勢時,政府需要設法逐一應對和拆解,消除經濟震盪所造成的危機,化解市民對社會局面的憂慮,鞏固他們對政府的信心。倘若稍有差池,結局縱然不變,卻只能是慘勝。這一年暴動的教訓使執政者猶有餘悸,開始鞏固改革的道路,編寫香港歷史的另一頁。

註釋

- ① 參見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flict: The Hong Kong Disturbances, May 1967-January 1968 (Hong Kong: Swindon Book Co., 1970)。該書是第一本以六七暴動為主題的專書,其中一章提及暴動的影響,包括經濟方面。往後論著不乏提及暴動的起因、經過及結果,當中亦有評論暴動對香港政治、經濟及社會等方面的影響;然而,卻未見從「經濟戰」的角度來予以分析。
- ② 許崇德運用現存數量可觀的政府歷史檔案,探討暴動期間政府與左派在「文宣」和「武鬥」兩條戰線上的對壘,立體地呈現雙方的策略、抗爭及平暴的細節。參見許崇德:〈攻心為上:香港政府應對「六七暴動」的文宣策略〉,《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5年2月號,頁64-81。
- ③ 麥志坤指出,香港對英國來說是個具有經濟價值的殖民地,乃因香港在地緣和歷史上對英國的對華貿易起着很大的作用。而在二戰後的解殖浪潮下,香港這個殖民地是英國維持大國地位的象徵。英國若要維持香港的殖民管治,往後必然要跟中國政府打交道。另一方面,新中國在建國初期與美國發生多次衝突,如韓戰及台海危機,更曾被美國實施經濟封鎖。在這個局勢下,香港成為中國最便利的對外窗口,同是也是英、美兩國之間的棋子。由此可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政策是冷戰時期中國在全球戰略部署所下的一枚棋子。參見 Chi-kwan Mark,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7 (Oxford: Clarendon, 2004), 12, 19-26。
- ④ Chi-kwan Mark,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216.
- ⑤ Hong Kong Labour Department, *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er of Labour for the Financial Year 1967-68*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8), 7.
- ⑥ 參見*Hong Kong: Report for the Year 1966* (Hong Kong: Government Press, 1967), 313; *Hong Kong: Report for the Year 1967* (Hong Kong: Government Press, 1968), 313 ∘
- ① 石志夫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史:1949.10-1989.1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頁234-36。

- ® 根據香港官方數據,香港每年從中國進口的貨品有工業原材料(如紡織紗、纖維品、製成品及非金屬礦物製品)和食品(如穀類、肉類、蛋類、蔬菜、水果、活生家禽),而每年中國進口的總額亦是各個主要供應地中最高的。1966年香港貨物貿易中,中國的總入口額最高(27%),跟隨其後的是日本(18%)、美國(11%)及英國(10%)。1967年的情況相若,中國(22%)、日本(19%)、美國(14%)、英國(9%)是香港入口貨品的四個主要供應地。參見Hong Kong: Report for the Year 1966, 311; Hong Kong: Report for the Year 1967, 311。
- ⑨ 張少強:〈錮身鎖命:中國對香港的食水及食物供應〉,載張少強、梁啟智、陳嘉銘主編:《香港·城市·想像》(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4),頁45-46。
- ⑩ 戰後港府為確保本地食米供應及儲備充足並穩定米價,自1955年起實施食米管制計劃。在1958至1966年間,泰國食米佔本港整體食米市場約五至六成,而中國食米則佔二至三成,這反映香港的主要食糧依靠外地供應。參見香港工商業管理處:《香港米業概況:並附工商處長於立法局致辭全文》(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1967),頁2、5、18。
- ① 1957年政府發展觀塘工業區時,由於區內供水有限,室礙某些工業種類的發展,一些用水量大的行業如紡織業和漂染業,便不能提早在觀塘工業區覓得廠址。參見"Report of the Working Committee of the New Industrial Area at Kun [原文如此] Tong", 27 January 1956, HKRS270-1-1, Land for Industry—Kwun Tong Ind. Area—Proposed Development Stage III, enclosure 12.1,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本文所引檔案皆來源於此,下引不再另註)。
- ⑩ 參見《香港商報》記者集體採寫:《五月風暴》(香港:義聲出版社,1967)。
- [®] Hong Kong: Report for the Year 1967, Appendix III, 284-85.
- ⑩ 5月6日,由於有工人阻止人造膠花廠「出貨」,於是資方向警方求援,繼而引起雙方衝突。資方十分關注「出貨」一事,因為這關乎商品傾銷與資金流轉的問題。及後左派發動示威、聲援、遊行,影響波及港島和九龍兩地,期間警方多次實施宵禁。後來,5月22日的「花園道事件」更令社會上不同機構的工人相繼發起停工、停駛、停航,抗議政府的鎮壓。從5月23日到6月9日,接連出現工人發起的停工、停駛、停航,涉事的機構既有私營機構,亦有政府部門。參見《香港風雲圖錄(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一六月三十日)》(香港:義聲出版社,1967),頁23-38。
- 10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關於反英抗暴鬥爭的幾個問題〉,《戰鬥通訊》,第2號(1967年7月1日),頁3。
- ⑩ 不少研究六七暴動的學者指出當時中國的對港政策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彈性處理香港的主權問題,故短期內不會收回香港。周恩來在處理六七暴動一事上強調要「有理、有利、有節」,並避免文革思潮波及香港,破壞一直以來的對港政策。另一方面,英國後來亦分辨出北京與香港左派在對香港進行抗爭的取態上並非沒有差異,有助香港當局準確地判斷當時的形勢。例如聯邦事務部(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FCO)檔案指出六七暴動的推手是香港左派,不是北京。參見"The David Davies Memori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Case Study of Disturbances in Hong Kong in 1967",17 August 1970, FCO40/263,enclosure 3,收入HKMS189-1-129,Disturbances in Hong Kong 1967/1968。在審視六七暴動的發展時,需要辨明英國政府與香港政府之間、北京與香港左派之間,並不是同質的主體,不一定有着相同的意志、思量及政治考慮。⑪ 參見《組成浩浩蕩蕩的反英抗暴大軍》(香港:香港三聯書店,1967);《血債血償》(香港: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1967);《以牙還牙》(香港:
- ⑩ 鄭郁郎:《在香港看香港》(香港:懷樓書房,1967),頁44。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1967)。

⑩ 當時香港主要的交通及公用事業大部分由英資財團投資,或與後者有密切的關係。從這些企業的「來往銀行」來看,皆與英資的匯豐銀行有密切關係,足見英資財團對當時香港經濟發展的影響力。此外,有報導指大罷工使英資銀行出現

四大困難,包括存款劇減、放款難收、倒賬及開支費用急增、銀行企業矛盾重重。 參見《香港風雲圖錄》,頁39:〈大罷工擊中港英要害 英資銀行出現四大困難〉, 《大公報》,1967年7月24日,第4版。

-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發言人發表談話迎接抗暴新高潮》 (香港: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1967),頁1-2、7。
- ② 參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發言人發表談話迎接抗暴新高潮》,頁8:《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號召放手地幹!放膽地幹!》(香港: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1967),頁2: Ming Ma, *The Riot in Hong Kong*, 1967 (Hong Kong: Sky Horse Book Co., 1967), 66。
- ②《香港風雲圖錄》,頁52、54;大公報編:《我們必勝!港英必敗!》(香港: 大公報,1967)。
- ◎ 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香港: 香港政府印務局,1967),頁5。
- 廖 據檔案披露,交通處處長薛璞(A. J. Shephard) 曾聯同勞工處處長郟亮同(R. M. Hetherington) 協助受罷工影響的交通及公用事業的企業,消弭左派工會的影響力。薛璞致函給大部分企業的經理,並對不同企業中的左派勢力作出概要評估,如電車公司只有右派工會,並無左派工會,但不少其他企業的左派工會頗為強勢。此外,薛璞在信中亦向企業經理提供一些應對左派工會的方法,都屬較溫和的、諮詢式的方法。這樣有助消除左派對資方渲染的負面形象,建立正面和良性的勞資關係。參見"Letter from the Commissioner for Transport to Hon. Paul K. C. Tsui on 28 September 1967", 28 September 1967, HKRS394-17-3, Hong Kong Disturbances 1967—Labour Front, enclosure 70。
- ⑩ 該報告開宗明義指出,1967年左派意圖挑起罷工干擾港口運作,令當局察覺有需要研究調查本港港口的營運狀況。參見Marine Department, *Survey and Report on Port Facilities, Service and Practices* (Hong Kong: Marine Department, 1969), 1。
- ∞ 參見《香港風雲圖錄》,頁66。
- ◎ 〈對共特自請解去台灣的剖析〉、《香港工商日報》、1967年6月15日、第2版:<〈歡呼海員兄弟的制裁港英行動〉、《大公報》、1967年7月17日、第4版:〈海員罷運各界歡呼港英驚惶發出哀鳴〉、《大公報》、1967年7月18日、第6版。
- 有關省港大罷工與六七暴動的比較,參見丁新豹:〈省港大罷工與六七暴動:歷史背景、成因、反響初探〉,載沈旭暉主編:《1967:國際視野的反思》(香港: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5),頁24-31。
- ® "More than 100 Vehicles Damage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 August 1967, HKRS394-17-3.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56, no. 7 (1967): 424; no. 8, 472; no. 9, 512;
 no. 11, 640; no. 12, 688.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56, no. 6 (1967): 336; no. 10, 484.
- © © "Despatch by the Governor to the Secretary for Commonwealth Affairs",13 February 1968, HKRS890-1-7, enclosure 15.
- 據《香港風暴》所載,當時「除了集會、遊行、街頭宣傳演出、發傳單、掛標語、插紅旗、放汽球等『文鬥』之外,港島的西區、灣仔和九龍的深水埗、九龍城、荃灣等地區,群眾也紛紛出擊,繼續打『街頭游擊戰』,有時一夜就有六、七處『戰場』,燃燒着抗暴的烈火」。參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編:《香港風暴》(香港: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1967),頁35。
 據庫珀指出,1967年整體訪港旅客人數達到527,365人次,而1966年則有505,733人次。若果不是發生騷動,1967年訪港旅客人數有望突破六十萬人

次。另據左派的説法,「五至七月份來港遊客人數,每月平均比四月份減少百分

- 之二十,即每月平均減少遊客一萬一千多人,而遊客在港消費則每月平均減少約二千萬元」。參見 John Cooper, *Colony in Conflict*, 276-77;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迎接偉大的國慶 迎接更大的勝利〉,《戰鬥通訊》,第5號(1967年9月26日),頁5。
- ⑯ 廣交會,即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每年有春、秋兩季,在廣州舉行。第22屆秋季廣交會在1967年11月15日至12月15日期間舉行。展銷商品包括工業、農業、手工藝品的產品。據悉,這次廣交會原定在10月15日舉行,但卻順延至11月15日開幕。參見《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特刊》,1968年第1期,頁36:"Despatch by the Governor to the Secretary for Commonwealth Affairs".
- ⑩ 〈紅磡土瓜灣戰士戳穿「香港週」臭底「骯髒週」展覽昨盛大舉行〉、《大公報》、 1967年11月3日,第5版。
-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迎接偉大的國慶 迎接更大的勝利〉, 5
- 49 《香港風暴》,頁133、135。
- ⑩ Colonial Secretariat, *Hong Kong Disturbances 1967*, 45-46∶另外參見 "Inward Telegram to the Commonwealth Office", 12 July 1967, FCO40/129, enclosure 6,收入HKMS189-1-52, Water Supplies。
- ⑩ 「制水升級」指政府在7月13日開始每四日供水四小時。參見〈港英為何升級制水 供水工程揭穿陰謀〉、《大公報》、1967年7月24日、第4版。
- ❷ 從1967年12月到1968年5月,港府根據輸水協議繳交水費,但屢遭中國銀行退票,銀行指港府與東江一深圳供水工程管理局所聲明的水費金額有出入。當時深圳已恢復供水,故不太可能是政治手段,而很有可能是行政上的問題。參見 "Savingram from the Governor,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Commonwealth Affairs", 9 August 1967, Enclosure II, III, FCO40/129, enclosure 37,收入HKMS189-1-52。
- 圖 當時世界衞生組織的食水鹽度標準是990百萬分率(p.p.m.),而本港食水的鹽度是900百萬分率。參見Colonial Secretariat, *Hong Kong Disturbances 1967*, 48。
- Memo from Colonial Secretariat to Distribution below on 15 February 1968", 15 February 1968, HKRS890-1-7, enclosure 15.
- 試情可參見1967年11月19日至24日的報章,當時普遍報章都把「英鎊貶值」一事登在頭版,足見社會十分重視這次經濟危機。
- Ming Ma, *The Riot in Hong Kong, 1967*, 160-61; Colonial Secretariat, *Hong Kong Disturbances 1967*, 30, Appendix IV.
- ◎ 〈港英昨晚宣布港幣隨英鎊貶值 物價勢將飛漲廣大同胞均受害〉、《大公報》、 1967年11月20日,第1版。
- ◎ 〈美總統詹森稱 英鎊雖貶值 黃金價不變 仍維持每盎士卅五美元〉、《香港 工商日報》、1967年11月20日、第1版。
- ◎ 〈港幣貶升活劇中左派五豐行 一夜損失一千港萬元〉、《香港人》、1967年第10期,頁3。
- ❸ 1966年九龍騷動令政府明白「廣播」和「報紙」這兩大傳播媒介的重要性,亦意識到報紙輿論會受到市場及讀者口味的影響,不一定靠近政府立場。因此,報告書認為「報紙」是溝通政府與市民的媒介,可加以利用。參見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頁86。
- ❸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 頁87。
- ◎ 何家騏、朱耀光:《香港警察:歷史見證與執法生涯》(香港:三聯書店, 2011),頁176-77。
- "Memo from Commissioner of Labour to Establishment Officer on 3 November 1967", 3 November 1967, HKRS230-1-211, 1967 Disturbances—Special Payment to Govt. Servants (Labour Dept.), enclosure 2; "Memo from Colonial"

Secretariat to Hon. Commissioner of Labour on 9 November 1967", 9 November 1967, HKRS230-1-211, enclosure 3; "Memo from Commissioner of Labour to Honourable Colonial Secretary (for Establishment Officer) on 19 December 1967", 19 December 1967, HKRS230-1-211, enclosure 4. 這份檔案主要關於政府向1967年騷動期間加班的公務員發放特別津貼,包括加班費、的士費、膳食費及其他雜費。

- 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六(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頁64-65。陳君葆(1898-1982)是香港知名學者,活躍於文化教育界,在1934至1956年間受聘於香港大學,擔任中文學院教席及馮平山圖書館館長。其人生平參見陳君葆:《陳君葆日記全集》,卷一,頁iii-iv、vi-vii。
- ❸ 10月18日,港九紡織染、五金、樹膠、內衣、搪瓷、絲織等六個產業工會號召展開「反失業、反飢餓鬥爭」,發起「一元運動」。其後,不同行業和機構的鬥委會相繼響應。參見《大公報》,1967年10月25日,第3、4版。
- ⑩ 〈六行業失業大軍昨會師 千人怒控港英製造飢餓〉、《大公報》,1967年10月28日,第4版。
- ⑩ 〈市民為暴亂犧牲的代價問題〉、《香港工商日報》、1967年11月11日,第2版。
- ② 〈各業工人紛起控訴港英〉、《大公報》、1967年11月1日、第1版。
- ⑩ 〈工人鬥委發表聲明 嚴正警告港英當局〉、《大公報》,1968年4月27日, 第1版。
- ⑩ 〈反英抗暴鬥爭進入新階段 海運工人決復工堅持鬥爭〉、《大公報》,1968年4月30日,第4版。
- ® 截至1967年7月底,政府的財政收入為1.46億元,支出為1.51億元,錄得赤字為500萬元。1967年財政年度首四個月(4月至7月)錄得累積赤字為2,700萬元。 參見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Hong Kong Hansard: Reports of the Meeting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7), 393。左派指政府在「四至八月份赤字已達七千餘萬元」,此説並不正確。參見《香港風暴》,頁48-49。
- ® 參見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Hong Kong Hansard: Reports of the Meeting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393。據1967年《香港年報》,1967至1968年度的預算收入是18.8億元,預算開支是19.2億元,預計赤字為3,700萬元。參見Hong Kong: Report for the Year 1967, Appendix VI & VII, 303-305。
- [®]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Hong Kong Hansard: Reports of the Meeting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395.
- 爾 據1967年《香港年報》,1967至1968年度的實際收入是19億元,實際開支 是17.7億元,錄得盈餘1.3億元。參見Hong Kong: Report for the Year 1967, Appendix VI & VII, 303-305。
- ⑩ 1960年代中期,政府已有意推動社會改革,例如在1966年2月成立一個政府部門聯合工作小組,研究香港社會保障問題,並於1967年4月完成報告,可見政府已關注到當時的社會問題。此外,1966年九龍騷動的發生亦加強政府對改革的決心,事後的調查報告建議政府應關注青年服務工作。由此看來,六七暴動只不過是提醒政府,社會改革是緩和官民矛盾及疏導社會不滿情緒的根本方法。這促使政府日後在房屋、教育、社會福利等方面推行惠民措施。參見A Report by the Inter-departmental Working Party to Consider Certain Aspects of Social Security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7):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